



五台山为何被称作“清凉山”

□王晨

一称谓并非民间俗传，而是经典籍佐证、高僧阐释与官方认可，最终固化为五台山的专属符号。究其根源，清凉山之名，始于天地造化的物理清凉，成于佛法奥义的精神清凉，二者相融，方成就这一传世美名。

五台山坐落于五台县境内，属太行山脉北段，五峰高耸、平顶如台，独特的地理地貌造就了当地高寒的气候，这是“清凉”之名的先天底色。明代高僧释澄所撰《清凉山志》作为权威的方志典籍，开篇即点明“（五台山）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佛教典籍《华严经疏》中亦云“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两大典籍互为印证，将自然气候与山名由来直接绑定。

从地理实测来看，五台山主峰海拔超3000米，台顶终年积雪，全年平均气温多在零下，即便盛夏七月，平均气温也不足10℃，素有“六月披裘”之说。山间密林蔽日、溪流潺潺，无酷暑蒸腾之苦，远观峰峦叠翠、寒气自生，这种极致的体感让人以“清凉”冠名。唐代《法苑珠林》更是直白记载：“代州东南五台山，古称神仙之宅也……地极严寒多雪，号曰‘清凉山’。所以古来求道之士，多游此山。”自然气候的独特性，让“清凉”成为五台山最直观的标签。

若仅以气候论清凉，天下高寒山地众多，唯独五台山独享“清凉山”圣号，核心在于其佛教圣地的专属定位。在佛教教义中，“清凉”绝非仅指气温凉爽，更寓意破除烦恼、解脱尘俗、心性澄澈的境界。唐代《古清凉传》作为首部五台山志，其中明确指出：“今山上有清凉寺，下有五台县清凉府，

此实当可为龟鉴矣。”自然清凉与佛法清凉深度融合，使“清凉山”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称谓，而是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的圣境之名。

五台山“清凉山”的称谓得到了官方与学界的一致认可，历代文献均延续这一定论。隋唐以降，历代帝王敕建寺院、册封圣境，均以“清凉山”为五台山专属别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名称的正统性。顾炎武在《五台山记》中引述经疏，也再次确认了“清凉山即代州五台山”的史实。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高僧大德登临五台山，皆以“清凉”为题咏志，既叹服山间无暑的清幽，更感悟佛法涤心的澄澈。这种自然与人文的完美契合，让“清凉山”超越了普通地名的范畴，成为五台山独有的文化IP。

时至今日，五台山依旧是盛夏避暑的净土、修心悟道的圣地。“清凉山”之名，藏着天地造化的馈赠，载着千年佛法的传承，既是对自然风貌的精准描摹，更是对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华夏名山文化中熠熠生辉的一笔。



北台叶斗峰 杨国军 摄



五台山 陈宝 摄

开栏语

作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之一、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五台山以其独特的自然禀赋、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多元的人文内涵，成为三晋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2009年，五台山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文化魅力的重要名片。

五台山自东汉永平年间第一座寺院落成，历经近两千年风雨，是中国唯一一个青庙黄庙交相辉映的佛教圣地。这里不仅有南禅寺、佛光寺等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更保存着从北魏至明清多个朝代的古建筑艺术。

本期起，《文化旅游周刊》开设“寻美五台山·人文史话”专栏，系统梳理五台山的自然奇观、历史脉络与人文精神。专栏将以通俗生动的笔触，带领读者探寻千年佛国的前世今生，感受“清凉圣境”的独特韵味，体悟文殊道场的智慧传承。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清凉世界，在山水间遇见文化，在禅意中触摸历史，在传承中感悟文明，开启一场洗涤心灵的文化之旅。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字里行间，领略五台山的壮美与深邃，读懂这座千年名山的文化密码。

在华夏名山谱系中，五台山既是享誉中外的佛教圣地，也是独树一帜的避暑胜境，千百年来“清凉山”的别称与本名并行流传，成为这座山脉最鲜明的文化印记。“清凉山”这

与书同行

生命的搁置与文学的理想

——赵志峰短篇小说集《搁置》序

□梁生智

小说要直逼人性。何谓人性？何谓人性善、人性恶？似乎从来没有定论，也无法讲清，何也？如果仅仅从概念上来讲，永远不可能说清这个问题，永远会是一本糊涂账。

任何一个人，只有在生存的过程中，只有在具体的事件中，只有在必须面对选择时，才可能呈现出善或者恶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也可能只是就一件事情的发生显现的判断，并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的善与恶。实际上，任何人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在与周围的人群相处中都可能要更为复杂，也很难用简单的“善”与“恶”来评判。许多时候，人生要面对的是诸多“无解”，面对的是诸多无法选择的选择，面对的是自我的迷失，面对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人性是极难定义和判断的。

那么，小说又如何能直逼人性？这实际上也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应该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基本上所有作家的起步都可能只是因为热爱，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当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与对文学艺术的热爱相遇时，就会变成追求，并且开始尝试。尝试往往是幼稚的，不成熟的，甚至与文学相距甚远的。于是，多数人在这种尝试中因为失败而放弃。文学终究成了一个梦。但是，那些真正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会从失败中思考，去不断思考文学的特质。然后再次开始，可能经历无数次被否定，但是依然坚持。在这种坚持中，不断地认识和体会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让文学成为自己的理想。为实现这个理想，不断观察和体验生活，感悟生命中的所有，不断阅读和思考，同时修正着自己的创作，终会步入文学的殿堂。赵志峰也不例外，或者说他的创作之路要更为艰难。

我们知道，看似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其实是复杂多变的，许多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即使不是突发的事情，那些规定了的心、知肚明的现象也可能成为改变一个人命运的诱因，或让人飞黄腾达，或让人万劫不复。对于多数人来说，生活实则像走钢丝，总是小心翼翼，提心吊胆，明明在万般努力，不敢有半分懈怠。如果是一直生活在极为普通的社会层面，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以及极好的人际关系，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成为涉及其生活与生命的导火索，让其生活与生命搁置。

在已经走过的人生岁月中，赵志峰基本上就是小心翼翼地对付着自己的生活与生命，不是他不努力，也不是他缺少才情和智慧，只是因为他的所有努力都抵不过他普通

人的现实。何况，他还一直热爱着文学。但是，也正是这种煎熬和折磨让他更真切、更痛彻、更深刻地理解着社会现实，理解着普通人的命运和人生，也促使他成了一个普通人群体的代言者。这一切还是源于他对文学无可救药的热爱。阅读他的这部小说集，从始至终让人感动和思考的就是生命的搁置与文学的理想。

赵志峰的短篇小说集《搁置》（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生和命运的作品集，在这部作品中，每一篇小说都首先让人感受到的是作者对普通人的关注。也许作者深切地知道，作为一个写作者可能是什么也不能改变的，或者还有一种深深的无能为力。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又清楚，文学的使命就是发声，为所有人发声，尤其是应该为更多普通的人发声。

不同于诗歌和散文，几乎所有的小说总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等来概括和反映生活及生存，通过这样的生活与生存揭示人的社会情态，以及社会价值和意义，从而促使更多的人思考自我，思考自我与他人，思考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毋庸讳言，社会中诸多悲惨的、令人愤怒的、让人崩溃的事物才可能更值得被关注、被表现。而作家的关注和表现会远离“新闻”，深入到本质，去探寻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改变的可能。这正是文学的理想，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和责任。也正是这样的良心和理想，让赵志峰的作品充满着悲悯情怀。

“人们习惯于琐碎日常，习惯于无动于衷。”这是他在《我们跳舞吧》中借人物斯安陆表述的生活中无数人的心态。在《盼星星盼月亮》里，同样是借人物“我”讲出“人生嘛，就这么回事，你不能当真，一当真就不是人生了”。在这部作品集中，所有的人都是被“撕裂”的，甚至是“绝望”的。而赵志峰小说的艺术魅力也正是突于此。为普通人代言，写社会底层人的命运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因为不好写，很难写。这些人的生活很难拿出来谈事，甚至连不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故事，缺少轰轰烈烈的壮举，缺少吸引人的情节，如果让人注目，很可能是悲惨的“事件”。赵志峰勇敢地步入其中，义无反顾，他为普通人代言，或者说他就是为自己发声。他愿意为自己的文学理想“拚命”。

不能否认，一个作家需要想象力，发现力、感受力、洞察力、捕捉力、判断力和表现力，但是，一个作家更需要坚持良心，坚持责任，同时要善良，永怀悲悯。作家要有批判世



界的勇气，要能够对世界作出反思，这才是对社会充满希望的正确态度。因为自己是普通人，而且还是生活与生存并不如意的人，只是因为酷爱着文学，酷爱着创作，所以，赵志峰其实是比更多的人多了不少的苦恼和无奈。不管生活有多少坎儿，有如何不如意，作为一个创作者，他的良心总是将其逼在救赎和自我救赎的路上，也逼着他更多地关注着社会，尤其是那些普通人的生活。他习惯于从这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中思考，发现，进入他们的生活和内心。

在所有的小说中，“搁置”几乎成为一个符号。赵志峰笔下一个个主人公那些无以言说的生活状态，生命悲歌，都在“搁置”中呈现。《气味》中李沁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无奈；《唱支山歌给党听》中积极为班集体争取荣誉的同学们的集体无奈；《一夜难眠》中孙二想要负责却不能负责的无奈；《扶自行车的男人》中，单位发不了工资，从不多管闲事，却在狂风中不断去扶被风刮倒的自行车，最后被当成小偷的王小虎的无奈。《秋事》中王小宁和“我”莫名的无奈；《建梅》中主人公建梅被撕裂的人生无奈；《方小妹》中伤害和自我伤害的无奈；《小美》中林敏伟对爱的无奈；《张林强的失踪事件》中，丁老师因为不能让“一辈子亏心”，对每一个学生都极为负责，却有一个让人不省心的学生张林强的无奈；《残阳如血》中那个被逼到情绪极境的、从来都是唯唯诺诺活着，却怒目圆睁挥起长刀的“他”的无奈……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事，不

能判断，不好判断，却不动声色地将郁结的忧伤写到了极致。赵志峰总是把浓郁的悲伤和痛苦埋在淡淡的叙述中，这反而会让悲伤累积起来发酵，让阅读者被触动。

“搁置”多数时候是一种无奈，有时候却也是一种智慧。就像小说的叙述和营造。“呈现”，这是小说的一种表述方式，能给阅读者更多的空间。在这部作品集中，就呈现了赵志峰作为一个永不停歇的创作者对小说创作的态度，不同事件，不同人物，不同情绪，他会采用极为吻合的表现手法去表现。这也让他的小说呈现出表现手法多样、阅读感受不一的艺术特色。比如说《李彩霞》中，少女时期的李彩霞形象是这样的：“……连衣裙。碎花。白底，蓝色的碎花。明亮的额头。她在微笑。牙齿很白，很整齐。”准确的、断续的、回忆性的描述风格，呈现的是记忆中的一个铭心刻骨的形象。而在《一夜难眠》里，“孙二恨不得抽自家两个嘴巴子。”这样活灵活现的语言，就逼真细腻地把内心善良又身处矛盾中的孙二的心绪活动突显出来。

在小说中，赵志峰还表现出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这种幽默又加深了其小说的感染力。在《生命来临》中，有这样的描述：“她指指自己的肚子，忽然意识到我的明知故问，就顺手照我脸上扇一扇，却并不用劲儿，相当于清风似的轻柔一拂，我顿觉惬意非常。”这里充满的是富有生命情趣的幽默感，从而很好地表达了夫妻俩面对即将来临的新生命，满怀喜悦的情状。

“一天一天凑合下去”“拚命”。赵志峰只是通过“我”进行平淡的叙述，却将这一类人的辛酸和无奈倾倒了出来。“为了这个家庭，我必须斯文扫地，必须像叫花子一样，沿着柜台、大街，高声叫卖，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人讨价还价，丧失了尊严、人格，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怜兮兮的钻钱眼的角色……”（《生计》）“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并不能说明什么。长时间的伪装与欺骗，让我负重重重，痛苦不堪。”（《盼星星盼月亮》）

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都是这样，他们为最简单的生活“拚命”，却常常被一根稻草压得“搁置”。赵志峰将目光聚焦在普通人的无奈上，所以，折射出的是一个作家的悲悯情怀，这也是他的文学理想。202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韩国作家韩江，颁奖词称“其充满诗意的文字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性”。是啊，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性，这必须是一个作家拥有的觉悟和良心，否则其创作宗旨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一点上，赵志峰的创作是具有类似基因的。

博古知今

石器代表着人类对工具的加工使用；陶器将泥土通过水与火，第一次合成了新物质；铜器、铁器为人类社会的飞跃发展带来曙光。相较而言，金银器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性贡献不强，然而金银以其稀有难得、绚丽灿烂的自然魅力，带着一种生命的灵性，始终在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中起着微妙作用，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黄金，在自然界中多以游离状态存在，可以直接获得。银在自然界中主要呈化合物状态，需掌握提炼技术。金银及其器物，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承担了货币、赋税、赏赐等多种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波及语言词汇，如“金口玉言”“金科玉律”“一刻千金”“惜墨如金”……可以说，黄金、白银用天赋的色彩描写了生活的诗、历史的事，成为古代社会文化的微观镜像。

用于装饰，大约是黄金最初的功能。与夏代同时期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金环、银环，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银首饰。到了商代，很多遗址和墓葬中发现金箔、金叶、金丝，大多是黏附在棺椁、漆器、车马具上的饰品。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发现的黄金面具、金杖、四鸟绕日金饰，有强烈的祭祀和崇拜意义。从制造技术上讲，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金片极薄，厚度仅约0.01毫米；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金面具等，采用了锤揲、剪切等多种手法，表明当时工匠对黄金的性能已很熟悉。

容器的出现是金银器发展中划时代的标志。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盃、杯和器盖，形体大，花纹精细而复杂。春秋战国时，金银错、鎏金已是常用技术。进入汉代，金银器制造摆脱了主要作为附属装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金银器皿数量、种类增多，有盘、碗、盆、盒、壶等，还有金灶模型、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金银印章以及各种首饰。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刘胜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出土的金银器，是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现。

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外来输入品增多。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的银盘、北魏城址的银长杯和银碗等，都来自西亚或中亚。外来器物为中国金银器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唐代宫廷的奢华风格和官营管理成就了金银器的一个高峰。在陕西西安李静训墓、西安南郊何家村、宝鸡扶风法门寺地宫及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宫等都有大量精美的金银器出土，其造型、纹样常被其他材质的器物借鉴，引领时代风尚。

宋代以后，由于金银器原材料更加充足，器物产量增加，商品化和平民化倾向渐浓，批量生产使模式化、成套的器物纷纷出现。产品以崭新的风貌向两个相反方向发展：一个是更加华丽、精细，一个是趋于素朴、简洁。前者服务于贵族富豪，后者满足普罗大众。宋元金银器的造型和纹样发生明显改变，普通的碗、盃、杯、碟、盘、盒、瓶各有不同样式。有些器皿造型直接取材于自然界，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纯洁，桃子象征长寿，梅兰竹菊象征君子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韵味，这是中国民俗艺术史上的新现象。

士大夫的审美影响了高档金银器产品的制造，诗情画意的场景、闲情雅致的意蕴经常体现在器物装饰图像上，并题有诗句。仿古或复古风格的器物又是一个重要现象，通常是模仿先秦时期青铜礼器，不仅有鼎、簋类的造型，还施有云纹、雷纹、饕餮纹等，精巧别致，古色古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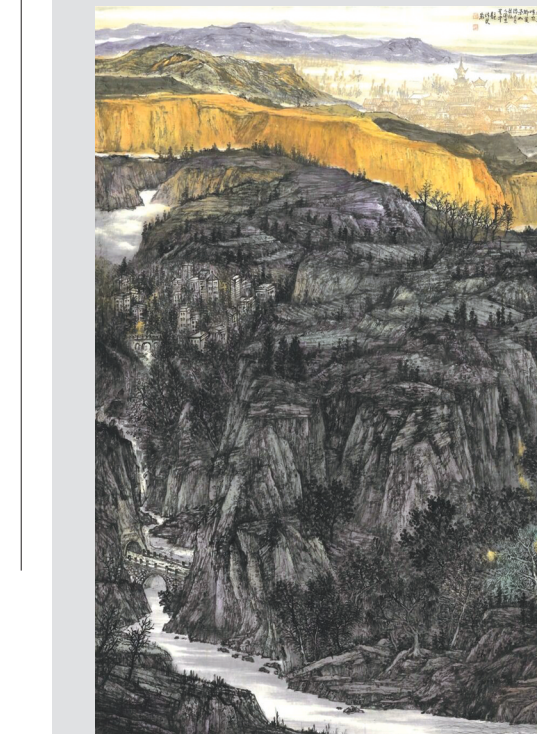
明清金银器的用途更为广泛，渗透到宗庙建筑、宫廷装饰、冠服首饰、文房用具等方面，器物无固定模式，很多向纯艺术性、观赏性方向发展。明清金银器制作不仅更加精细，还常常与镶嵌工艺结合，各种宝石镶嵌使器物更为奢华，或是以金掐丝填烧琅琅的新工艺出现。累丝工艺的作品更堪称金银细工一绝，具有织物般柔软华丽的质感，显示出对金属材料特性更深刻的了解。

金银器质地上的可塑性和外观上的绚丽，使人们用物质材料表达精神生活的形式更加丰富，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礼仪、技术、艺术、时尚、理想及对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风貌与变迁。

金银器中的『诗』与『事』

□齐东方

画说



弓淑英 作